

邵武萍逸集

• 上册 • 方汉奇 编

邵 飘 萍 选 集

上 册

方汉奇 主编

•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)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(北京鼓楼西大街桥胡同61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•

开本：850×1168毫米32开 印张：19 插页5

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475 000 册数：1—2 500

•

ISBN 7-300-00189-0 / I·12

书号：10011·61 定价：4.50元



邵飘萍（1886—1926）

邵飘萍纪念碑碑文

邵飘萍原名新成，又名镜清，后改名振青，字飘萍，笔名阿平、素昧平生。生于1886年10月11日，金华市东阳县大联乡紫溪村人。1898年中秀才。1902年考入浙江高等学堂，毕业后回到金华，一面教书，一面为上海各报撰稿。1911年和杭辛斋合作，在杭州创办《汉民日报》，以才华过人，受到同行爱重，被推为省报界公会干事长。1913年因发表反袁言论被捕入狱。1914年赴日留学，课余组织东京通信社，向国内各报发稿。回国后，先是在《申报》、《时事新报》、《时报》担任主笔，继应聘为《申报》驻北京特派记者，为该报拍发新闻专电。1918年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和著名日报《京报》^①，任社长，亲自撰写评论和采访重要消息，受到读者欢迎。同年，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，毛泽东等为会员，他应聘为导师，定期讲学，在会员中留下了深刻印象。1919年5月积极投入五四运动，曾在北京大学学生召开的公共集会上慷慨陈词，揭发曹汝霖、陆宗輿、章宗祥等人的卖国罪行。同年8月为逃避军阀迫害，再度赴日，应聘为《朝日新闻》顾问。在日期间，精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历史，写成《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》和《新俄国之研究》两书，为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作出了贡献。1920年回国，继任《京报》社长。1925年经李大钊、罗章龙介绍，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在此前后，他以《京报》为讲坛，积极支持二七罢工、五卅

① 根据最新发现的材料，新闻编译社创办于1916年，《京报》创办于1918年。

运动和三·一八反帝爱国运动，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国共合作的南方革命政府，协助《向导》、《政治生活》等党刊的出版，和党的北方区委保持密切联系。所著《新闻学总论》、《实际应用新闻学》两书，促进了我国新闻学研究工作的开展。1926年4月24日以“宣传赤化”罪名被奉系军阀逮捕，同月26日遇害。终年40岁。邵飘萍既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学者，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为宣传马克思主义而献身的革命烈士。他的事迹将永垂不朽，他的名字将永远为人民所景仰和怀念。

（录自1986年7月1日立於浙江金华市婺州公园内的邵飘萍烈士纪念碑。方汉奇撰文。）

纪念邵飘萍（代序）

方 汉 奇

邵飘萍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文化战线上的勇猛将士，杰出的新闻工作者、新闻学者和新闻教育工作者。他谱名新成，又名镜清、振青，笔名飘萍，浙江东阳人。1886年10月11日（光绪十二年丙戌九月十四日）生于金华。祖父加入过太平军，父亲邵桂林是当地私塾的教师。邵飘萍青少年时代即以早慧闻名于乡里，12岁就考上了秀才。1902年考入杭州浙江高等学堂。1905年在该校毕业，返回金华，在金华中学任教。同时应聘为《申报》特约通讯员，为该报撰写金华通讯，开始和新闻事业发生关系。1911年再次到杭州，和当时在杭州的辛亥革命时期著名报人杭辛斋合作办报，任《汉民日报》的主编，开始了他的办报生涯。《汉民日报》被迫停刊后，他转往上海。1914年由上海东渡日本，就读于东京政法学校，课余和潘公弼等同学一道，创办东京通讯社，为京津沪汉各报提供东京通讯。1915年底返回上海。应邀为《申报》《时报》《时事新报》等报撰写评论稿件。1916至1918年接受《申报》聘请，担任该报驻京特派记者，负责撰写“北京特别通信”。在此期间，他还在北京创办了一所通讯社——新闻编译社，并一度兼任章士钊主办的《甲寅》日刊的主编。1918年10月5日，他以个人的力量创办大型日报《京报》于北京，同时参加了中国第一个新闻学团体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创建活动，应邀担任该会的导师，和当时是这个研究会会员的毛泽东、高君宇、罗墩阶（章龙）等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。1919年8月《京报》被皖系军阀封闭，他再次东渡日本，应聘为大阪《朝日新闻》社的顾

问，并系统地考察和研究了日本的新闻事业。1920年皖系倒台，他回到北京，恢复了《京报》的出版。在办报之余，他还致力于教育事业，曾经应聘为北京平民大学报学系和法政大学的教授，讲授新闻学课程，编写出版了《新闻学总论》和《实际应用新闻学》两部新闻学专著，并担任了务本女子大学的校长。1926年4月18日奉系军阀进入北京，他于4月24日被捕，4月26日凌晨被害。邵飘萍不仅在中国新闻史上享有盛名，在中国近代现代文化史上也有一定影响。他的一生，是为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民主革命事业奋斗的一生，是一个正直的爱国的新闻记者的战斗的一生^①。他的被害，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封建军阀的无比愤慨，他的名字已经成为和封建军阀作斗争的牺牲者的象征。在他被害以后的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内，他一直受到人民的同情、尊敬和怀念。

邵飘萍的战斗业绩是十分丰富的，成就是多方面的，最值得纪念和学习借鉴的是他的以下三个方面的精神：

第一，勇于探索与时俱进的精神。

自从鸦片战争以来，不少先进的中国人就在探索挽救危亡和振兴中华的道路，在他们的努力下，经过了无数的胜利和挫折，经历了两次大的腾飞，才取得了民主革命的胜利，建立了新中国。邵飘萍也是这个行列中的人物。青年时代的邵飘萍是孙中山民主革命事业的积极支持者，他和光复会系统的革命党人曾经有过接触和通信上的联系。辛亥革命后，不少革命者在“革命功成，革命党消”的口号下退隐了，蜕化了，他却仍然坚持民主革命的道路，在舆论战线上，和封建军阀官僚进行坚决斗争，他在

① 邵飘萍后来经李大钊、罗章龙介绍，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1986年7月1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在批复浙江省、金华市委的报告
中，承认了邵飘萍的党籍，入党时间确定为1925年。

《汉民日报》上发表的许多评论，就表明了他的这一坚定立场。二次革命失败后，又有一些坚持过革命的人退缩了，他却奋然而进，高举反袁的旗帜，和袁世凯的帝制自为活动作斗争。词锋的锐利，态度的勇猛，在侪辈当中都是比较突出的。这一时期发表在《申报》《时报》《时事新报》上的不少社论和短评，就是历史的见证。五四运动爆发，他是积极的参加者，曾经在“五四”前夕（5月3日晚7时）召开的群众集会上慷慨陈词，呼吁救亡，使到会的1千多人都为之动容。“五四”以后，他继续站在革命的立场，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作斗争，在《京报》上发表了大量攻击和揭露北洋各系军阀官僚投靠帝国主义、昏谬贪残丧权辱国等罪行的通讯报道和评论。五卅运动，三·一八运动，他都是积极的参加者，并曾经给运动以有力的舆论支援。尤其难得的是，他虽然参加过旧民主主义革命，却并不以旧时期的民主革命思想自囿。当十月革命的消息传到中国以后，他立即表示欢迎，并热心地向读者介绍十月革命后的新的苏维埃政权各方面的成就，称颂她是“世界历史上的新纪元”，预言“今后果见社会主义之成功，其影响于世界，将较诸美国独立法国革命之威力为尤著”（《新俄国之研究》序），鼓吹中苏建交，赞成“以俄为师”。与此同时，他还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，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劳动者必胜的左券，公开在他所办的《京报》上发行纪念马克思诞辰105周年的特刊，悼念列宁逝世的特刊，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。邵飘萍在1921年以前，没有加入过任何党派。但自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，他就积极和党保持密切的联系，为党作了大量工作：协助党报党刊和党的一些宣传品的印刷出版，帮助党培养新闻工作干部；给北方党领导的二七罢工和开滦五矿罢工活动以舆论上的支持；同积极参加国共合作的孙中山、冯玉祥等国民党领袖和将领，保持密切关系，给他们的革命活动以舆论上的声援。邵飘萍

的一生，是在救国救民的道路上，不断探索、不断前进，生命不止，奋战不已的一生。他的这种上下求索与时俱进的精神，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。

第二，坚持真理，为之献身的战斗精神。

在旧中国的新闻记者当中，邵飘萍称得上是有骨气的。他坚持独立办报的方针；主张新闻工作者应该“艰苦卓绝”；应该“虽幽囚受辱而安之若素”；应该“尽自己之天职”，“平社会之不平”，“苟见有强凌弱，众暴寡之行为，必毅然伸张人道，而为弱者吐不平之气，使豪暴之徒不敢逞其志，不能不屈伏于舆论之制裁”（《新闻学总论》47—48页）。这些主张虽然受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影响，有一定的局限，但矛头主要指向禁锢言论的北洋军阀，是为了使报纸能够摆脱他们的束缚，坚持民主革命的立场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有积极意义的。从这一立场出发，邵飘萍还提倡新闻记者应该有“贫贱不能移，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”的精神；经常以“铁肩辣手”自勉；以“铁肩担道义，妙手著文章”作为自己和全体《京报》工作人员的座右铭。他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作的。由于经费困难，他有时也接受一些人的资助，但从不为反动军阀所左右。对反动封建军阀的高价收买，往往嗤之以鼻，断然拒绝。在从事新闻工作的14年当中，他曾经四被追捕，数入牢狱，而民主革命之志终不屈挠。只要是合乎真理，合乎正义的事情，他认准了，就一定坚持到底，鼎镬不辞。在袁世凯和直系奉系军阀炙手可热的时候，他公然直斥前者为“袁贼”，称后者为“国民公敌”、“鲁民公敌”、“一世之梟”，攻击军阀之间的内讧为“以暴易暴，毙一虎而仍生一狼”，指出军阀政府的统治，“比强盗更可怕”。三·一八事件爆发，他名列段祺瑞政府颁发的黑名单的第十六名，《京报》被列为准备“扑灭”的四种报纸当中的第一种，他仍然把矛头对准残民以逞的皖系军阀，鸣鼓而攻之。奉系军阀进京前，冯玉祥曾

经派鹿钟麟三次去他家，劝他暂时放弃《京报》，离开北京，他自己也知道“私仇公敌，早伺干傍”，形势险恶，对他十分不利，但仍坚持不去，遂及于难。这种在真理面前敢于坚持，敢于斗争，不惜为之献身的执着精神，是难能可贵的。

第三，精益求精，锐意改革的进取精神。

邵飘萍在新闻事业的各个方面都十分出色当行。他不仅是一个著名的新闻记者，也是一个著名的报刊活动家，报刊政论作家，新闻理论家和新闻教育家。在以上这些方面，他都努力钻研，锐意创新，时时有所发现，有所发明，有所前进。

在新闻学理论的研究上，邵飘萍是一个开拓者。他所写的《新闻学总论》和徐宝璜的那部《新闻学纲要》，同属中国最早的一批新闻学著作。就其整个体系来说，邵飘萍的新闻学观点还是资产阶级的。但是，他并不满足于原封不动地照搬西方新闻学专著中的那些陈词滥调，而是根据中国的情况加以研究和发挥，有不少独到的见解。他强调新闻的真实性，以“探究事实不欺阅者”为新闻报道的第一信条；他强调报纸的指导性，反对所谓的“有闻必录”和趣味至上。他认为在资本家垄断一切的资本主义制度下，新闻事业只能随人俯仰，并不是“理想的事业”等等，这些观点都很有见地，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。

在新闻业务的实践上，邵飘萍是一个勇于创新的人。他从不墨守成规，从不固步自封。他从开始办报活动的第一天起，就致力于新闻改革，在新闻写作、新闻编辑、新闻采访和报纸经营管理等各个方面，他都有不少新的建树。

在新闻评论的写作上，他针对以往的报纸评论“少事实而多论断”，好发空论的缺点，很注意用事实说话。他认为，“事实乃最易于证明是非”，“其足令读者同情信仰，反较诸凭空臆断之言为有力”（《新闻学总论》第20页）。他还主张写评论要“简洁明快”和“含有美术之意味”，“除去记述某问题之理由见

解外，其文词亦具几分动人之魔力”。他所写的时事评论，不论是长篇的社论，或是百把字几十字的短评，都“清通简要，雅善饥弹”，很有特色，很引人看。

在新闻通讯的采访和写作上，邵飘萍也有很多创获。他从开始办报的第一天起，就积极参加新闻采访活动，后来当了主笔、主编、社长，仍亲自动手采访重要新闻。他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记者称号的记者。在担任《申报》驻北京记者期间，他两年内就写了250多篇新闻通信，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和同行们的热情称赞。他十分重视采访的艺术，每次采访都能作到“发问不多，使言者无所遁饰”（汤修慧《实际应用新闻学序》），“旁敲侧击，数语已得要领”（张季鸾《追悼飘萍先生》）。在总结采访经验的时候，他提出记者必须细致、机警、敏捷，有很强的观察力、推理力、联想力，有很好的文化教养，讲究精神文明，恪守职业道德。这些主张对提高记者的素质和水平，都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。在新闻通讯写作上，邵飘萍使用的是一种夹叙夹议虚实结合的体裁，他的文章恣肆流利，生动活泼，对同时期的新闻写作，也起了一定的影响。

在报纸编辑工作上，邵飘萍十分注意标题和版面的安排。他所主办的《京报》，栏目众多，新闻通信和评论结合紧密，标题多行多层次，“尤极活泼显豁之能事”（潘公弼《纪念飘萍先生》）。当时的北京各报纸办得都很死板，《京报》的异军突起，对当地报纸编辑工作的改革，起了一定的带头作用。

在报纸经营管理的改革方面，邵飘萍的成绩也是十分显著的。他创办的《京报》最高发行达6000份，是当时北京地区发行量最大的一家报纸。由于经营管理得当，创刊两年就自建了两层楼的馆舍，这是当时北京新闻界唯一的一家。《京报》附设的昭明印刷所，除了承印《京报》外，还接受其他印刷出版业务，经济效益也很好。在办报过程中，邵飘萍十分重视利用和依靠社会

力量。只有十几个编辑工作人员的《京报》，除了日出两大张正张外，还先后出了《京报》副刊、《莽原》等23个副刊，就是充分借重社会力量的结果。《京报》在经营管理上取得的经验，曾经引起当时国内新闻界的普遍重视。

在新闻教育事业上，邵飘萍也是一个开拓式的人物。他十分关心新闻人才的培养。不论在新闻学研究会，还是在平民大学报学系和法政大学，他的课都很受欢迎。他讲课时深入浅出，理论联系实际，并且十分注意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。他所编写的两部教材，是中国新闻教育史上最早的一批教材。在他指导下出版的新闻学研究会机关刊物《新闻周刊》，是当时“中国唯一传播新闻学知识之报纸”（戈公振《中国报学史》）；在他指导下出版的平民大学报学系的《新闻学级刊》，被认为是“报界罕有之出版物”（同上）。

邵飘萍在新闻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，说明他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一个富于进取精神的改革者。他在新闻改革方面长期积累下来的许多经验，是值得研究、借鉴和学习的。

邵飘萍不是一个完人，他有不少缺点，也有一定的历史局限，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，也是可以根据当时的情况加以说明而不必苛求的。

今天，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已经完全推倒，邵飘萍所热爱的新闻事业、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事业，在党的领导下已经后继有人，空前繁荣。他如有知，可以欣然瞑目了。

（1984年11月1日在邵飘萍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的发言。）

编辑说明

一、本书收入邵飘萍历年在报刊上发表的各类文章共600余篇，70余万字。全部选自他主办的，或他担任编辑、记者参加撰稿的《汉民日报》、《时事新报》、《时报》、《申报》、《京报》、《东方杂志》等报刊。由于年代久远，各图书馆收藏的上列报刊多已残缺不全。其中一些则由于种种原因，借阅困难，无法选录，因此不少年份出现了空白，只好从阙。邵飘萍的《新俄国之研究》、《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》、《新闻学总论》、《实际应用新闻学》等论著，已单独出书，没有选入。

二、本书根据所收文章的性质，分为新闻通讯、论说、短评、专论、其他（随笔、启事等）五部分，分上下两册。上册收入的是第一部分，即新闻通讯部分，其余部分编入下册。各部分的文章均按写作时间，顺序排列。

三、每篇文章均以发表时的主题为篇名。其副题和子题则排在篇名的下面，各个副题和子题之间用斜线作为间隔，不另起行。每篇文章的题目下面，用括弧标明写作时间。月日不详的，用×代替。凡属系列性的通讯报道如“北京通信”、“中央通信”之类，除标明栏目和系列编号之外，还保留各篇原有的子题。无子题的，从阙。为节省篇幅计，目录上只标出其中的第一子题，其余从略。

四、本书选录的各类文章，发表时原无标点，现均予标点分段。原文的繁体字、异体字，已改为规范简化字。作者原注用（ ）标明。凡肯定是错字，则加（ ），下加〈 〉将正字注于其中。难以判断的，只好维持原状。凡缺字或印刷不清难以辨识

的字，用□标出。脱字注于〈 〉中。发表文章的时间、报刊名称和署名，括弧注于篇末。为方便读者计，个别地方作了简单的注释。

五、本书编选时所使用的报刊，分藏于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、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资料室、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资料室、北京图书馆、北京大学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、大连图书馆。本书的选录工作，得到过它们的协助和支持。参加本书编选注释工作的有方汉奇、张绍宗、谷长岭、孙晓阳、莽萍等五位同志，方汉奇任主编。

目 录

邵飘萍纪念碑碑文
纪念邵飘萍（代序）

编辑说明

（一）新闻通讯

日人所谓国体变更之里面（1915年9月4日）	（1）
关于间岛问题之过去和现在（1915年9月18日）	（8）
记日本议员渎职要案（1915年9月13日）	（5）
日人所述之济南近况（1915年9月25日）	（7）
日人观察帝政问题之表里（1915年10月2日）	（10）
日本对于银行策之进行（1915年10月×日）	（12）
日人心目中之间岛问题（1915年10月5日）	（13）
日本与南洋华侨（1915年10月×日）	（15）
青岛马贼之大秘密（1915年10月×日）	（17）
青岛之现在与将来（1915年10月×日）	（19）
日本对我帝制问题之三说（1915年10月16日）	（21）
日人论其政府之对我警告（1915年10月26日）	（23）
东京暗杀案中之趣闻（1915年10月27日）	（25）
英俄法日之同时一箭（1915年10月30日）	（27）
今后外交之形势如何（1915年11月3日）	（29）
日人在哈尔滨之现状（1915年11月×日）	（32）
东邻外交界要闻（1915年11月6日）	（34）
我国断送利权之痛史（1915年11月×日）	（36）

日人之观察旅韩华人 (1915年11月×日)	(40)
帝制延期中之日本态度(一) (1915年11月15日)	(42)
帝制延期中之日本态度(二) (1915年11月18日)	(45)
我国可加入欧战团体乎 (1915年11月21日)	(48)
我国加盟风说与日本言论 (1915年11月23日)	(50)
日人之我国经营蒙古观 (1915年11月×日)	(54)
加盟问题之东京消息 (1915年11月30日)	(62)
帝制与日本 (1915年12月3日)	(64)
与驻日陆公使晤谈记 (1915年12月×日)	(66)
日本政局之旁观 (1915年12月16日)	(68)
东京外交界最近消息 (1916年1月×日)	(71)
日人对我特派大使之猜测 (1916年1月×日)	(73)
日本之对我政策如何 (1916年1月×日)	(75)
日本两要人之谈话纪要 (1916年1月×日)	(77)
日人所希望于俄国特使者 (1916年1月×日)	(79)
东京外交界要闻(一) (1916年1月×日)	(81)
东京外交界要闻(二) (1916年1月×日)	(84)
东京外交界要闻(三) (1916年1月×日)	(86)
东京外交界要闻(四) (1916年1月×日)	(88)
东京外交界要闻(五) (1916年1月×日)	(90)
东京外交界要闻(六) (1916年1月×日)	(92)
东京外交界要闻(七) (1916年2月×日)	(95)
东京外交界要闻(八) (1916年2月×日)	(97)
东京外交界要闻(九) (1916年2月×日)	(99)
东京外交界要闻(一〇) (1916年2月×日)	(101)
东京外交界要闻(一一) (1916年2月×日)	(103)
东京外交界要闻(一三) (1916年2月×日)	(105)
东京外交界要闻(一四) (1916年3月×日)	(106)